

桂诗春

英语教育
自选集

桂诗春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桂诗春英语教育自选集

Gui Shichun'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H319.3/50

:7

2007

桂诗春

英语教育
自选集

桂诗春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桂诗春英语教育自选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Gui Shichun'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桂诗春英语教育自选集 = Gui Shichun'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桂诗春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11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5600-7080-3

I. 桂… II. 桂… III. 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IV. 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4837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丛书策划: 刘相东

责任编辑: 刘相东

封面设计: 袁 璐

封面题字: 赵发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30.75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080-3

定 价: 4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出版前言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批共推出10本，入选作者有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秦秀白、刘润清、张正东、文秋芳、刘道义等英语教育名家。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 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 以英语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丛书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丛书将在推出第一批后，陆续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外研社还将推出《国际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的内容必须与英语教育有关，如语言政策、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法、词典与英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特殊用途英语、计算机辅助教学、文学文化与英语教学、语料库与英语教学、教师培训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课程设计与材料评估、英语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小学英语教学、儿童英语教学、双语教育、在线英语教育、远程

英语教学，以及其他与英语教育有关的论文。

四、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和期号（或出版社名）。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如演讲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五、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六、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书后附有作者著述目录。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主 任 胡文仲 李朋义

委 员 胡壮麟 王守仁 石坚 秦秀白 杜瑞清

策 划 刘相东

序

桂老师这本《自选集》即将付梓，让学生为之写序，荣幸之余，感受更多的则是一种莫名的不安，惟恐写出个不象样的东西来，配不上老师几十年的精选之作。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乐意一试，因为集子里的论文伴随着我的学术成长，我想把自己的一点感悟与读者们分享。

桂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应用语言学开拓者，一辈子勤奋耕耘，著述丰厚，不可能全都选入这本集子。文章的取舍，个中道理，已在他的《自序》中交代。巧合的是，所选文章的年代跨度大致上从我跟他读研究生的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其中不少我早已拜读，老师的治学之道，一直影响着学生，相当大的影响就是来自他的论著。这些用汗水浇灌的研究成果，除了本身极高的学术价值之外，更多反映了一位成功学者走过的学术道路，让我们看到一位应用语言学家是怎样练就的。

年轻时期的桂老师教过本科生的英美文学课，发表过有关的论著，如果继续沿着文学研究的路子走下去，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文学研究学者。而今，人们心目中的桂老师却是我国名扬天下的应用语言学家。说来似乎难以令人置信，当他毅然决定从文学转向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时候，他已到中年，而且正值文革后期，国家对外不开放，科研荒废，经费匮乏，外语不受重视，要书无书，要刊无刊，研究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然而，在那种困境里，当人们尚不知应用语言学为何物之时，桂老师已经步入了应用语言学的学术殿堂，沉浸在研究的喜悦之中。更令人惊异的是，除了教学之外，他还长期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从系主任一直当到校长，研究只能靠业余挤时间。显然，艰苦的研究条件与他取得的学术成就极不相称，是什么

神奇的力量助他成功呢？

有志者，事竟成。这一箴言用在桂老师身上恐怕再恰当不过了。若要对他的卓越成就说出个原因来，应首推他对教师职业的酷爱和他的敬业精神。在一次教师节纪念会上，我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会选择当教师！”言之壮美，着实令人感佩。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给了他研究应用语言学无比的激情和不竭的动力。其实，应用语言学并不神秘，它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探讨外语教学和学习的规律，是一门指导外语教学实践的学科，是所有外语教师的必修课。这门学问能够提升外语教师的素质，非但不与文学、文化、翻译等研究方向发生冲突，而且能使教师的研究专长在外语教学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桂老师研究应用语言学，实则是做他自己的本行。他干一行爱一行，咬住不放，不满足于经验性的教学，而是执著追求职业的完美，不断探索教学和学习规律，借鉴国外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将教学经验上升到理论认识，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同行们分享。

正是基于对外语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一旦有机会接触到对外语教学和学习有用的东西，桂老师就会兴奋，就会去探索、研究、尝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得一机会访问英国，目睹了应用语言学在英国的兴盛，面见了将二语习得研究推向独立学科的著名应用语言学家 P. Corder。桂老师认为那次访问激发了他对应用语言学的兴趣，导致他转向应用语言学研究。在学生看来，他的转向与其说是外部机遇造成的，不如说是他热爱外语教学的内在动力促成的。同去英国访问的不止他一位外语教师，为什么惟独他为外语教学的新出路而激动并迅速付诸行动呢？

在这本《自选集》里，桂老师的研究激情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在研究的早期，他孜孜不倦地自学应用语言学理论，拓宽视野，向外语教师引介国外研究成果，同时呼吁大家重视和开展应用语言学研究，特别是要结合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需

要,推动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创新和发展。他不仅呼吁,而且还率先垂范,接下来的成就是最好的说明。语言测试是外语教学的重要一环,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在这一领域,桂老师曾经运用应用语言学去解决我国的重大实际问题。20多年前,我国的高考英语实行改革,他与李筱菊教授等同事一道,领头引进国外的语言测试理论和统计技术,在广东率先开展标准化考试试验,梳理了英语高考的每个环节,攻克了考试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摸索出一整套操作性强的考试程序,极大地提高了考试的信度,为推进我国考试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我国的语言测试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提高了我国语言测试研究的声誉和学术地位。对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桂老师在《自选集》里自有评说。今天,随着人们对考试的认识不断深化,尽管对标准化考试有褒有贬,但批评中少有针对考试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性成果的,这些正是当时考试改革的重大阶段性成就,为后续改革做了坚实的铺垫。测试专家们现在认识到:考试改革不仅有技术问题要解决,还有社会问题需要认真对待;考试应用的时效性强,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完善。考试中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人能够解决的,桂老师尽力做了一个学者能够做到的事。

桂老师一直专注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是我国学生的英语学习心理。弄清楚外语是怎样学会的是搞好外语教学的前提,他研究英语学习心理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了提高我国的外语教学水平。外语学习心理属于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今的二语习得学科定位在认知科学,外语教学与认知的关系密切也顺理成章。桂老师早就关注到这一点,及时将认知科学引入应用语言学研究,这在他的论文集里有深入的讨论。为了有效地探讨外语学习心理,研究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与杨惠中教授等人合作,开发了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向外公布的含有言语失误标注的英语学习者语料库,还与宁春岩教授合写了《语言学方法

论》，系统归纳和总结了语言学研究方法。这些成果为研究者们揭开外语学习之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打开了深入研究的空间。桂老师的科研选题眼光，令人不得不钦佩。

读桂老师这本内容丰富的《自选集》，还会有更多的启迪。而令我感受最深的是，桂老师的成功经历其实很简单：热爱本行，做好本行，持之以恒。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任何外语教师，只要热爱自己的职业，就会积极进取，就会想方设法去探索教学规律，就不会排斥应用语言学，最终也一定会取得成就；桂老师既没有读过博士，也不是什么应用语言学科班出身，但是，在我们周围众多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博士群里，有谁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能跟桂老师相比呢？他的成功经历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么？

王初明
2007 年 1 月

我与中国英语教育

——自序

从我国近代史（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有了自己的以英语教育为主的外语教育¹。外语教育从一开始就和实现中华民族魂牵梦绕的“富国强兵”理想联系在一起。150 多年来，中国的英语教育学家一代又一代地薪尽火传，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营造英语教育的巍峨大厦。在我国学习英语的人数从当初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发展到超过美国的总人口（Eoyang, 1999）。面对着这么庞大的学习群体，实现中国的英语教育的主体只能是中国的英语教师。实践出真知，中国的经验如果能够得到总结并上升为理论，理应受到国际英语教学界的重视。曾经在远东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的 Michael West（1960）写过一本书，叫做 *Teaching English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谈到怎样在学生众多的大班里教英语。他根据的主要是他在印度教学的经验，我相信根据中国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瞻远瞩，策划出版一套英语教育专家的自选集，可谓功德无量。我有幸被约请参与，初则感到荣幸和高兴，后则感到惶恐。因为自己虽然在英语教育界整整 50 年，各方面的教学工作都经历过，但始终未能在一个岗位上坚持不懈地工作和积累经验，往往浅尝辄止，谈不上有些什么体会，更谈不上有些什么学问。所以我的自选集里所谈到的，都属于姑妄言之，读者如能姑妄听之，则幸甚、幸甚。

外语教学 50 年

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给我一个回顾 50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的机会。而最后的感触就像屈原 2000 多年前在《离骚》里所吟唱的那样：“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问有如神话中的崦嵫，可望而不可及；也许快乐和满足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求索和攀登本身。我常常和我的学生说：“我不是什么教授、博导，最合适的帽子是‘图书馆员’。²也就是

说，我的学问只限于多懂得一点书本知识。”我也常对自己所受的训练不满，用两句话来与学生共勉：“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所以我的《自选集》里有不少文章都是基于亲自动手的试验性研究，我不敢说这些试验性的研究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而只能说它们都是我亲身“经过”的；问心无愧、冷暖自知。

1988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编了一本《外语教育往事谈》，收录了我写的《应用语言学与我》（桂诗春，1988）。在这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里，我谈到我的转向，归纳了我在外语界的三十年：十年准备、十年荒废、十年开垦。文章最后说：“十年开垦，说不上有什么收获，但是汗水终究是浇灌在这块新开辟的土地上。我希望自己能再有十年耕耘播种，更瞩目于我国新一代的应用语言学者以崭新的姿态去建基立业，为我国应用语言学春华秋实的到来而共同努力！”这真要感谢上天的好生之德，为我赢得比十年多一倍的时间。所以我的这本《自选集》实际上反映的是我这30年来垦荒的学术生涯，履痕鸿爪，让他人评说。

那么头20年又如何呢？“十年荒废”是我国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那就是“史无前例”的“文革”，这也无需细说。“十年准备”倒是需要略为交代的：我是1955年在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的。起初分到英语教研室，教过英语基础课，从给学生写英语字母描字本到上精读课、泛读课、语法课、写作课、大学英语课，但都时间不长，大概有三年光景。后来又安排到文学教研室，教过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选读、外国文学（给中文系学生开设）、毛泽东文艺思想等课程。在这十年里，在文学方面发表过三篇论文：《〈奥德赛〉主题初探》、《资产阶级“人性论”对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人·人情味·人性论》；参与苏联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和苏联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编的《英国文学史（1832—1870）》的部分翻译（从俄语译为汉语）。在语言学方面，写过一篇关于英语语法词类分类的论文（未发表），参与过中山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语法小组的《英语自学丛书》中的《英语语法入门》、《英语动词》、《英语句法图解》三本书的编辑和部分章节的写作工作。另外在广州《羊城晚报》也发表了一些杂文。我把这十年称为准备阶段是针对后来30年我转向从事应用语言学而言的。理由是：一、我并不认为需要把语言和文学截然分开，文学语言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语用域（register）。所以这十年的文学准备对我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二、我在这十年里，也没有离开语言、特别

是语法的研究。当时国内曾经内部影印出版了一批语言学书籍，我是一本不拉地全部买下，有空也看看。这为我后来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对我的转向，《应用语言学与我》（1988）有过一番交代，抄录如下：

“在‘十年动乱’中，我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一场噩梦，也无需细说。心灵中最大的创伤是幻灭感：以前种种，一笔勾销，以后种种，一片迷惘。在‘文革’中，我虚度了从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那一段十分宝贵的岁月，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西方崛起了一门新学科——应用语言学³。”

1973年，我有机会和几位英语教师一道，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访英一月。当时“四人帮”尚未倒台，我们访英是为了实现中英文化交流协议的一个项目，并非是当局对我国英语教学的改革有什么想法。我们在国外带回了一点书，也因为书的封面有“政治问题”而被上缴没收。而且回来后不久，就发生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并由此掀起“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反对学习外语的高潮。我们出去的几位同志尽管对访英颇有所感，但大都噤若寒蝉。

1973年之行对我的“转向”起了决定作用。出国前，我有机会通读了被视为第一本应用语言学教科书、M. A. K. Halliday (1964) 等三人所著的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算是得到一些启蒙。到英后，我们被安排在 Essex 的一个语言中心，然后请各地的一些名家来给我们讲学，如 Edinburgh 大学的语言学系主任 P. S. Corder、Essex 大学应用语言学系主任 P. Streven、英国小学外语改革规划的负责人 A. Spicer、英语教材编辑专家 L. Alexander 等等，另外还到伦敦、剑桥一些中学和英语训练中心参观。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英语教学（对外国人），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已沦为二等强国，一些英国教师不无感慨地对我们说：“英国只剩下两件宝：协和飞机与英语教学。”英法联合研制的协和飞机在和美国波音飞机的竞争中已败下阵来，大概英国人尚能夸耀的只有英语教学了。

自英国归来后，我决定转学应用语言学，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尚十分恶劣，而我也已步入中年了。我的抉择出于下面几点考虑：

1. 我对自己能否再搞文学信心不足。过去教文学史主要是靠苏联那几本外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那些文学史采用简单的、庸俗的政治

划线的办法去对待复杂纷繁的文学事实，苦了我们这些教书先生。因为政治标准不稳定，于是今天翻这个案，明天翻那个案，后天又把前天翻了的案再翻过来……我怀疑这种模式，却又找不到可供替换的模式。另外，为了教文学史，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读一些我丝毫不感兴趣的作品，亦一大苦事。有的作品卷帙浩繁，像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传》，没有兴趣，实难以卒读。但是世界上又恐怕没有几个人对文学史上的所有名家、名作都感兴趣。“文革”投下的阴影仍然深深地笼罩着我们，我在1961年曾写过一篇论文《奥德赛主题初探》，企图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阐述的观点来讨论荷马这首史诗的主题，认为史诗产生自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时代，其主题思想应该是歌颂希腊人为巩固新的社会秩序（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而作的斗争以及这斗争的胜利。我自以为这是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史诗，但在“文革”中却被批判为恶毒影射人民公社解体、反对“三面红旗”的大毒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产生弃旧图新的念头。

2. 看到了应用语言学的强大生命力。根据 L. Kelly 的说法，语言教学有二十五个世纪的悠长历史。但是语言教学一直以来都是经验性的、“自在的”教学活动，应用语言学的诞生使语言教学成为一门独立的、“自为的”科学，既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同时又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另外，一些新兴的语言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对我又十分有吸引力。这些学科的引进对我国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都会有促进作用。我们在英国一所综合中学的高中毕业班里听过一堂课，颇有感触。这是一堂英语课，老师上课先放几段录音给学生听，其中一段是女售货员的闲谈，一段是牧师的传道，一段是邱吉尔的战时演说，一段是教师的谈话。听完后，教师就引导学生们讨论，这几段话是什么人讲的？其职业、文化水平、年龄、籍贯等能否猜出来？他们讲话中有些什么语言特征、色彩可作为证据？学生们经过一段生动的讨论，终于都猜出来了。课后，我向任课教师请教，原来在高中毕业班里，英国文学与英国语言分设两门课。他当即送了我一本语言课的教学大纲 *Language in Use*⁴，整个大纲共有 110 个单元，从各个角度去教怎样使用母语。Halliday 在大纲《前言》中指出，这是以伦敦大学普通语言学系为基地，组织了一批专家工作了六年的结果。这是一个应用语言学的实例。反观我国，中学的汉语教学、甚至大学的《现代汉语》课，都是语文不分，以文代语，好像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汉语使用上已经

不成问题，便把精力全放到文章分析上面。要改变这种状况，出路在于普及语言学知识并把语言研究的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改革中去。

3. 我也分析了自己的条件。有不利的一面，如过去接触自然科学、甚至行为科学比较少，数学基础特别差；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对英语教学的接触面较广，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的书亦有所涉猎，而且对自己从中学以来逐步培养起来的自学能力，还有信心。至于我们学院，还有好几位同志一直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条件比我还要好。

当时我们一起访英的还有北大的罗经国教授、北外的张中载教授等，大家相约回国后得考虑一下转向的问题。可惜的是，回来后劳燕分飞，他们驾轻就熟搞回老本行，只有我坚持当初的选择，另辟蹊径。对此我没有后悔，而且感到我的选择很符合我的秉性，因为原来搞文学，前景并不明朗，而现在改弦易辙，希望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刘禹锡有一句话可以道出我当时的心情：“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那就是立足于自强不息，走创新的道路。在《应用语言学与我》的文章里，我也谈到我头十年的开垦工作，主要是创建应用语言学的硕士生课程。这包括开设课程、编写教科书、召开国内乃至国际的会议，为应用语言学在我国的发展做一些鸣锣开道的工作。其中的一些细节，在文章里都有所交代。这里就不多说了。

下面主要是根据《自选集》的编排来回顾我的学术生涯的几个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有些什么不足之处？庄子⁵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学问，谁都会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大可不必像他那样感到疲惫，而寄希望于来者。这也是庄子在文章最后说的：“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自选集》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语言教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自选集》的第二、第三部分基本上是围绕我们承担的几个国家项目而展开的。现分别作一些说明：

第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文章里，有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我长期以来思考得较多的问题。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在选文时采取了“厚今薄古”的做法，早期的作品尽量少选；如果选上，那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1. 作为一门科学去建立应用语言学。1978年11月我在《光明日

报》发表《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指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引进这个学科（应用语言学），组织广大教师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吸收这个学科的精华，以逐步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符合我国实际的应用语言学体系。”我这样强调是有理由的，应用语言学在西方崛起的年代刚好是我们饱受“文革”摧残的年代。上面提到的 Halliday 三人的那本书在 1964 年出版后，在国内即被影印出版，但未受到注意。1973 年我们访英前夕曾走访吕叔湘先生，他当时就建议我们好好读这本书，作为访英的准备。未想到抵英后，英方安排我们活动的项目都和应用语言学有关，因为这是他们觉得可以值得夸耀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眼界为之大开。我始终觉得要提高我国外语教学的水平，关键就是要用这个学科的理念、理论、精神和方法来武装我国的外语教师。20 多年来，我国通过兴办这个专业来培养研究生和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我近年来还是多次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1）外语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视，而各层的领导也都有学习外语的亲身经历，容易想当然，所以在有关外语教育的决策时需要强调它的科学性。（2）外语教育的业外人士（包括传媒界）也需要认识这个学科。例如报纸杂志要报道关于核电站的消息，要找一些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记者，但是要报道大学四、六级考试的消息，有谁会想到要找受过应用语言学训练的记者？（3）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学的英语专业一直都称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并按这个路子来培养学生。这个专业的教师都有其专业方向，自有其驰骋的天地，没有必要像我那样去“转向”；但是他们也应该认识到外语教学和他们所从事的专业一样，都是一门科学。也不能认为精通英国文学就等于精通英语教学，英语教学里面还有很多学问。而这个专业中从事基础英语教学的教师更需要用应用语言学的科学武装起来。

当然，话分两头。要建立应用语言学或是要使它的学科地位得到承认，到头来，还是要靠我国应用语言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吸收引进，大胆实践，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我国外语教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这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因为外语教育牵涉到很多政策性甚强的语言规划问题，所以最近又出现所谓“批判性教学”（critical pedagogies）和“批判性应用语言学”（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简为 CAL）的说法（Norton, 2004; Pennycook, 2001）。采取这种立场的应用语言学家感兴趣的是语言教学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和

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是语言学习者在了解他们自己、社会环境、历史和未来的过程中建立的。顾名思义,批判性应用语言学有别于“主流的”应用语言学,不能就应用语言学来谈应用语言学,而必须联系社会实践,⁶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对待应用语言学的一些敏感的问题。他们往往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立场有点偏激,但却注意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语言和权力的关系的问题、语言规划问题、语篇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如传媒中的虚假广告)、教育和考试中的不公平的问题,等等。Davies (1999: 20)在他的新著里确认 CAL, 并给以定义⁷, 而且认为“它可以在两方面起作用:首先对传统应用语言学做出批判;其次是通过批判性教学来做出示范,认识怎样从事应用语言学。”我国近年来对教育不公平现象(包括义务教育的投入、择校费、名校办民校、高考制度等等)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说明批判性应用语言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2. 要把外语教学或应用语言学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我首先在《应用语言学》(桂诗春, 1988)里提出这个思想,但是没有深入展开。1994(桂诗春)年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又看到 Larsen-Freeman 所写的文章(1997),深受启发,觉得从系统论上升到混沌/复杂性,可以拓宽视野,更深刻地了解外语教学的复杂过程。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看法问题,而是一个付诸实践的问题,例如通过大量收集各种变量的数据,使用计算机模拟技术来建立外语教学的模型。这是一个交叉学科的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来者。

3. 读者也不难发现,在这一组文章里,我们比较强调应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强调外语教学的认知基础。应该指出的是,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知语言学也是我国众所瞩目的一门新兴学科,前途无限。但是在我的文章里所谈到的认知和语言、认知和语言学习、认知和语言测试、外语教学的认知基础和认知语言学虽有密切的关系,却不是一回事。认知语言学的出发点是从认知看语言:语言知识(包括意义和形态、句法,甚至语音表征)基本上都是概念结构。所以语言不是像 Chomsky 所说的是一种独立的认知能力。而我在文章里所强调的是从认知来看语言的学习和使用,认为统治着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的是认知过程。这实际上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也是心理语言学的本质。这一点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语言知识来自语言使用。认知有许多层次:感知觉、注意、表象、记忆、理解、

意识、思维、决策、问题求解等等。它们都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有关，而我的文章所接触的问题仅是沧海一粟。Robinson (2001) 最近出版那本书 *Cogn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大体覆盖了相同的范围。

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的文章主要是一些实验性研究，围绕我们所承担的国家“七五”规划中的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语言学研究》和国家“九五”规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学习者英语错误分析》而进行的。

第一个项目的成果有两项：一是《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桂诗春，1991），二是论文集《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桂诗春，1992）。前者获广东省社联优秀成果二等奖，并作为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重印；后者获教育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奖。《自选集》所选的是我在李崑同志协助下所做的几个心理语言学研究，其他的研究则多是我的学生在我的指导下所写的博士或硕士论文，读者如感兴趣，可看论文集。应该说明的是：

1. 研究定位在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这是因为我们的着眼点在于了解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内在过程，从而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

2. 研究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过程是一个不会终了的科学探究事业，不能一蹴而就。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只能提出一个短期的目标，为我们在开展这方面研究摸索一个模型。所以我们在各个方面（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方法）都试图作一些尝试；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浅尝辄止，失之于表面，但我们觉得这在探索初期是难以避免的，好比面临着一条不知深浅的河，只能摸索前进。

3. 初步的几点归纳⁸：

1) 语言是人类认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处理（包括学习和使用）是在认知的制约下进行的。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心理过程的认识必须在认知科学的指导下进行。

2) 认知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基础，英语和汉语也有共同的基础，但我们在这方面挖掘得还不深，原因很多：或者是未注意到，或者是未能从认知科学的高度去考察，或者是研究工具太落后。另外一方面，英语和汉语又是语言体系很不相同的两种语言，这些语言体系的差别也有其认知根源，可以追溯到知识结构、信念系统、文化背景的不同，只有